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二九五期 ——  
(二〇〇二年六月十八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0206c)

---

【亡灵祭坛】储安平之死	谢 泳
【史海钩沉】再谈老舍之死	舒 乙
【亡灵祭坛】文革受难者老舍	王友琴
【抢救历史】《老舍之死》：对历史的激情与沉思	郭小聪
【研究笔记】1966年8月23日：一个“罗生门”式的历史圈套	傅光明
【人物追踪】“奇迹”浩然面面观	袁良骏
【往事追忆】红卫兵小报和我（十二）	周孜仁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

【亡灵祭坛】

储安平之死

• 谢 泳 •

储安平，男，原光明日报主编，1957年被划为“右派”，1966年被抄家批斗后失踪，当时储安平57岁。

1957年之后，储安平基本上就结束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生涯，因为从此以后他就不再为人所注意。他成为右派之后，一直由九三学社管着，从一般的生活待遇上说还过得去，只是精神上有很大的压力。他成为右派之后，他的长子曾在《文汇报》上发表过和他脱离关系的声明，那时他的婚姻也不幸福，他平时在家，很少和人交往。那时过去的老朋友只有梁漱溟还和他有些来往，可以想见他的内心是非常孤独的。

1966年文革开始以后，他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关于储安平的死，现在还是一个谜，他的家人也不知道他的最终结局，我曾和他的女儿说起过这件事，她也说不清楚。有人说他是

在北京一个地方跳河死了，还有一种说法是他在天津跳海了，也有说他是在青岛跳的海，也有人说他在新疆改造时，逃到苏联去了，前几年还有人写文章说他没有死，而是在江苏某地一个山上当了和尚。这些说法，都是传说，没有一点文献材料为证。所以我们现在只能说，储安平是不知所终，我个人以储安平的个性和他的经历推断，他是有自杀可能的。

他的小儿子，现居澳大利亚的钢琴家储望华在《父亲，你在哪里？》一文中说：

“父亲‘失踪’是在1966年9月上旬，那已是8月31日在京西青龙桥边潮白河自杀未遂后一个多星期。当时他从关押他的‘九三学社’后院小屋回家，看到家里已是第二次被‘红卫兵’抄家。居室、客厅均被洗劫掠夺一空，除了满地的碎纸乱片外，已一无所有。面对这般情景，父亲的心便整个地绝望了。于是他踉踉离开家中，走了出去。

到了九月中旬的一天，我接到当时主管‘九三学社’中央机关日常事务的梁某女士打来的电话，她问我：‘你父亲有没有到你那里去？’‘你知道不知道他目前在哪里？’我说：‘父亲不是被你们押管着吗？你们不是正在筹备批斗他的大会吗？’到了9月20日，中央统战部下达命令：一定要在10月1日‘国庆’之前找到储安平，‘以确保首都的安全！’于是‘九三学社’派了一名干部（中共党员），并要求我和我二哥协助。我们骑着自行车在北京的东、西城不少街巷转了好几天，查访了过去与父亲曾有来往的朋友们，却毫无结果。

到了1968年夏，有一天，几个穿着军装的干部来找我，说他们是‘奉周恩来之命，由公安部、统战部等组成储安平专案组，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查寻储安平的下落’，希望‘我提供情况予以协助’。首先他们要求我提供几张父亲的照片。我颇觉诧异：凭他们的权力，他们完全可以通过组织途径去向有关部门索取，相信不难获得他的照片，却偏偏来向家人索取照片，实在令我疑虑。事后听说这帮‘专案组’的人是有意通过这种试探，来考察我是否和父亲‘划清了界线’。”（台湾《传记文学》第55卷，第2期，第59、60页）

据储望华先生回忆，到了1966年秋天，他们寻找父亲的失踪仍然毫无结果，两后之后，又有人来调查储安平的下落，对于这种调查，储安平的家人已完全没有信心了。储望华先生说：“事实上，这是一个‘生死之谜’，如果‘活’着，为什么两年来没有任何活动迹象；如果已‘死’，死亡的时间、地点、方式，又如何得以确证。”储望华先生记得，早在60年代初，储安平曾和他说起过“想要自杀”的想法。自从反右以后，储安平虽然写过检查，虽然被改造，但他在心里并不以为自己是错的。更不想卑躬屈膝去求得一个“摘帽子”或者“平反”。这不仅是因为他有“脾气强牛”的个人性格，而是因为他身上有一些知识分子“可杀不可辱”的气质。面对“抱负”不能实现，屈辱不堪忍受，想到死是很自然的。那时他正在北京郊区石景山模式口“政协工地”进行劳动改造。

储望华先生回忆说：“记得有一个寒冷的冬天，我去探望他，给他带去些食品衣物，他独自住在一间阴暗的小茅泥舍中，房间的一半是他睡的‘炕’，另一半是一格格正在繁殖的菇菌，屋子里黑暗潮湿，充满着霉腐恶臭，完全不是人住的地方。”这是储安平在文革中的真实生活处境。储望华先生说，1982年6月，他准备去澳大利亚留学时，单位的一位领导才匆匆拿来一份文件，告诉他：“刚刚接到中央统战部来函，对你父亲正式做出‘死亡结论’”。这时储安平已经失踪16年了，这个结论对他的孩子们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一个终身为自由主义理想奋斗的知识分子，最后就这样消失的无影无踪，人们再想起他的时候，对很多人来说，他早已是一个完全的陌生人了。

— 1998年9月23日晚于太原南华门东四条

□ 摘自《储安平评传》

~~~~~  
【史海钩沉】

再谈老舍之死

• 舒 乙 •

这次，到台湾去，在老舍先生的有关问题上，发现台湾人对老舍之死普遍感兴趣，但所知甚少，基本上仍停留在我们十多年前的认识水平上，所争论的问题，也是我们早已解决了的。

在台北《中央日报》副刊举行的两岸文学座谈会上，台湾作家姜穆先生发言，说他一直认为老舍先生之死是他杀所致，理由有三：一、他死后腹中无水；二、脚下无泥；三、鞋袜都在岸上，结论是他并非投水自杀，而是被谋杀之后将尸体运来摆在了太平湖边。

我当时在会上说：这个问题早已有了一致的看法，大背景是“文革”的残酷迫害，具体死因是投水自杀。我举了五点理由，略加说明，并说我写过两篇比较详细的文章，可以参考，一篇叫《父亲最后的两天》，另一篇叫《死的呼唤》，后来又编了一本专门的书，叫《老舍之死》，说得更为详尽，台湾方面也早就有了盗印本。

会上没有来得及展开讨论。看来，我并没有说服姜穆先生。我回北京之后，看到他在《中央日报》长河版发表了一篇题为《被“文革”烤“文火”——老舍真是自杀？》的文章，还是重复了“他杀”的说法，这才使我觉得，问题并非那么简单，还是有再讨论的必要。

其实，“他杀”和“自杀”的讨论之所以必要，与其说对解开老舍之死的谜至关重要，还不如说，这个问题的解决对了解老舍这个人更有意义。

◇ 冰心先生如是说——特质

一次，和冰心先生聊天，她突然冒出一句：“我知道你爸，一定是跳河而死！”

我问：“您怎么知道？”

她不假思索地说：“他的作品里全写着呢，好人自杀的多，跳河的多。”

像《四世同堂》里的第二代，祁天佑老爷子，受辱后，没有回家，直接走到西直门外，一头扎进护城河里。

像《茶馆》里的王掌柜，受尽人间折磨之后，说了一串耐人寻味的话，诸如对小孙女说：“来，再叫爷爷看看！”“跟爷爷说再见！”“万一我晚上就死了呢！”最后上吊而亡。

像《猫城记》里的小蝎和大鹰，后者把自己的头割下悬在大街上，为了唤醒群众。

像《火葬》里的王排长和石队长，前者重伤后举枪自尽，后者用尽了子弹，放火自焚。

像《四世同堂》里的钱太太，一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贤妻良母，丈夫被捕，儿子一个阵亡一个被害，她不哭，不说话，一头碰死在儿子的棺材上。

像《老张的哲学》，这是老舍先生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写它的时候，作者不过二十六岁，它的女主人翁，叫李静，是一位可爱的文静姑娘，最后也是自杀而死。

在写李静自杀之前，小说中有这么一段伏笔：“人们当危患临头的时候，往往反想到极不要紧或玄妙的地方去，要跳河自尽的对着水不但哭，笑，而且有时候问：宇宙是什么？生命是什么？……那自问自答的结果，更坚定了他要死的心。”

这里说的是自尽，而且偏偏是跳河。

冰心先生的话极对，极准确。她深知老舍先生。他们是老朋友，知根知底的。

一个作家的作品中主人公的命运和他本人的命运，当然，用不着去划等号；但是，这些描写毕竟是他本人思绪的事物，所以，作家本人的身世往往会在他笔下的人物身上找出某些痕迹来，这倒是不容忽视的参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作品便是作家本人的脚印，表面上并不连续，显得杂乱无章，东一个西一个，但总体上看，可以觅出一个大概的走向。

从这个角度上看，作品是作家命运的相当可靠的“预报器”。

不连贯的轨迹也好，命运预报器也好，作品中的对应点对作家的研究者来说，都太有用了。

毕竟，作品是作家身外的第六感，它们来自他，由他而生，和他有着看不见摸不着而确实存在的内在的联系线。

这就是要注意作品的提示性的原因。

#### ◇ 气节、身谏、投水、殉难——哲学

如果仔细找的话，在老舍先生的自述中，主要是散文、书信中，还可以找到不少独白性的自我描述。

这些独白，是地地道道的他的思想的反映，是他的生死观，是他的人生哲学。

这些独白极为重要，实际上，是理解老舍结局的钥匙。

一九四一年，抗战中，文人们建议设诗人节，还真成功了，为此老舍先生写了一篇题为“诗人”的小文，发表在当年五月卅一日的《新蜀报》上。这里面有这么一段话，是谈诗人特质的：

“他的眼要看真理，要看山川之美；他的心要世界进步，要人人幸福。他的居心与圣哲相同，恐怕就不屑于，或来不及，再管衣衫的破烂，或见人必须作揖问好了。所以他被称为狂士、为疯子。这狂士对那些小小的举动可以无关宏旨而忽略，叫大事就一点也不放松，在别人正兴高采烈，歌舞升平的时节，他会极不得人心的来警告大家。大家笑得正欢，他会痛哭流涕。及至社会上真有了祸患，他会以身谏，他投水，他殉难！”

这最后一句话，简直是在说他自己了——及至社会上真有了祸患，他会以身谏，他投水，他殉难！

实在是太准确了，就是这么一回事。

我见过不少好心的朋友，他们对我说：老先生性子太暴，其实，忍一忍，躲一躲，过了那

可怕的几天，也就闯过来了。

听到这儿，我总是直截了当地反驳道：您不了解他，不会的，他必死无疑。活过了八月二十四，活不过九月二十四，活过了九月二十四，活不过第二年的九月二十四！

他的气质，他的性格，他的信念，决定了他的命。

一九四四年，抗战最艰苦的时候，日军欲从贵州独山方向包围偷袭重庆，重庆方面哗然，纷纷准备再向西撤，向西康方向逃，友人萧伯青问老舍：“您怎么办？”他脱口而出：“北面就是涛涛的嘉陵江，那里便是我的归宿！”

此话传出后，朋友们纷纷写信来询问虚实，老舍先生在给王冶秋先生的信中是这么回答的：

“跳江之计是句实谈，也是句实话。假若不幸敌人真攻进来，我们有什么地方、方法可跑呢？蓬子说可同他的家眷暂避到广安去。广安有什么安全？丝毫也看不出！不用再跑了，坐等为妙；嘉陵江又近又没盖儿！”

嘉陵江又近又没盖儿！

这是中国有气节的文人的一个含泪的惨笑，俏皮，悲壮，悲愤，十足的老舍味儿。

千万不要以为老舍先生是一个轻视性命的人，似乎动不动就要舍去了自己的生命。不是这样。大敌当前，他是准备拼命的。他的这种誓言，可以找到几十万字！谁都知道，他是最大的“抗战派”，而且是个拚命的务实的抗战派。他舍妻弃子只身逃出济南，来到武汉、重庆，投入抗战的洪流中，当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的总负责人，只有在夜深人静时，想家想亲人，暗暗地落泪。他在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五日深夜十点写给陶亢德先生的信里说：“我想念我的妻与儿女。我觉得太对不起他们。可是在无可奈何中，我感谢她。我必须拚命地去作事，好对得起她。男女间的关系，是含泪相誓，各自珍重，为国效劳。男儿是兵，女子也是兵，都须把最崇高的情绪生活献给这血雨刀山的大时代。夫不属于妻，妻不属于夫，他与她都属于国家。”

这样的信充满了热情，充满了对生活的眷恋，是生命的赞歌。

当这样一位有情有趣有血有肉的人说他要自杀时，显然，是发生了天大的事，或者，有一件天大的事占据了整个脑海。

这事，便是气节。

老舍先生有一段类似格言的话，写在抗战刚刚结束时，发表在一篇叫作《痴人》的短文里：“谁知道这点气节有多大的用处呢？但是，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民族的正气，我们宁贫死，病死，或被杀也不能轻易地丢失了它。在过去的八年中，我们把死看成生，把侵略者与威胁利诱都看成仇敌，就是为了那一点气节。我们似乎很愚蠢。但是世界上最良最善的事差不多都是傻人干出来的啊！”

这老舍式的格言真的伴随着老舍先生自己走完了他的一生，为他的生命划下了一个完整的圆圆的句号。

◇ 是非判断、独立思考——前提

气节也好，投水也好，殉难也好，身谏也好，前提是是非判断，而非是非判断的前提是独立思考：舍此便没有一切。

老舍先生是“文革”最早的殉难者之一。

一个合理的问题：那么早，他能看出有问题吗？

要知道，当时绝大部份人对“文革”是看不清楚的，相反，都心悦诚服地，虔诚地跟着毛泽东走，以为自己是对的，以为自己写的东西是毒草，自己需要彻底的改造。在作家群中大概只有茅盾先生，凭借他的丰富党内经历，有不同的是非判断，断然采取了不参加、不合作的态度。他的老资格地位对他也有天然的保护作用。他的情况可以算是少而又少的例外了。

那么，老舍先生呢？

他从一开始就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对“文革”持断然不同的看法。

这很奇特。

但，这是事实。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是星期日，这一天，我回过家，和大妹舒雨一起，和父亲有过一次认真的谈话。

这一天，离他挨斗的八月二十三日只相隔两天，离他自杀的八月二十四日只相隔三日。

认真，是指内容；形式上还是随便的，是地道的家庭式的聊天。

我，那一年，已经三十一岁，大妹二十九岁，我们和父亲的谈话是大人和大人之间的谈话。我们在父亲眼里，从来都是孩子；但是，在外表上，他从来都不把我们当孩子，这大概是他受外国的影响，早早地就以一个平等的身份对待我们，和我们行握手礼，直呼我们的学名，不再叫小名，好像暗示给我们，你是一个独立的存在，我尊重你。

他这个“五四”时代人，有根深蒂固的民主思想，他的名言是：

“不许小孩子说话，造成不少的家庭小革命者。”

那天的谈话是由“红卫兵”上街“扫四旧”做起的。“八·一八”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之后，“扫四旧”风起云涌。我们便谈些街上的事情给父亲听，譬如说王府井大街老字号的店匾已被砸，连“四联”理发店里的大镜子都被学生帖上了大白纸，不准照，理发照镜子都成了资产阶级的臭毛病。

舒雨说：“爸，您还不把您的小玩艺先收起来。……”

小玩艺者，摆在客厅宝多阁里小古董小古玩也，它们可能也是“四旧”吧。

父亲不容她说下去，斩钉截铁地，大声地，一字一蹦地，说了五个字：“不，我绝不收！”

以后的话，都是他的。

思绪由他头脑中飞出，连续续，大概是深思熟虑的，观点非常鲜明，并不费力，好像厨房中备好的菜肴，一会端出一盘来。我和大妹只有接受的份儿，完全无法插嘴。在他这段思想和那段思想之间便出现了冷场，房里安静得有些异常，反而加深了我们的印象。

“是谁给他们的权力？”……

（他明知故问，是谁发动了“红卫兵”。他是在问吗？不，他在怒，他在反抗！）（而且，这样问，也是犯大忌的，这也明明白白的。）

“历史上，外国的文化大革命，从来都是破坏文化的，文物遭到了大损害。”…… “又要死人了！”……

“尤其是那些刚烈而清白的人。”

他说了两位他的老朋友的故事，都是真实的故事。

一位死于“三反五反”运动，另一位死于“镇反”运动。他说的时候有名有姓，可惜，我们都记不住，好像一位姓纪，都是并没有正式反到他们身上，只是有了一点点端倪，也就是刚刚对他们有所暗示，有所怀疑吧，结果，两位都是在各自回家的路上，一头栽进了什刹海。

都是自杀。

都是投水。

都是身谏。

都是殉难。

都是刚烈。

都是清白。

都是抗议。

什么叫听者无心，说者有意？

这是最好最好的例子！

这方话音未落，他便死去了。事实，便是如此。

凑巧得很，父亲失踪的消息，偏偏是我首先知道的，我立刻首先告诉了大妹，我们交换了眼光，我们偷偷地交换了看法：他去了。

因为，我们立刻想起了三天前他明明白白说过的话。他等于已经告诉了我们。

果然，二十四日早上太平湖里找到了他的尸体。

他的衣服、手杖、眼镜都整齐地放在岸上，他一步一步踏着芦苇叶和水草走向湖水，让湖水吞没了自己，呛水而亡，离岸边大概也不过十米远。他的口袋里有他的名片，写着他的名字：舒舍予，老舍。

我由第一秒钟起，便绝对相信：他在受尽一天一夜的残暴殴打奇耻大辱和进行了惊心动魄的刚烈的直接反抗之后，投水自杀。

没有第二种选择。或者，反过来说，如果有第二种选择，那绝不是他！

因为，他已经把事情看穿了。

因为，他早已为自己设计好了结局。

#### ◇ 他曾到过什刹海——序幕

一九八七年二月十八日，我曾有机会访问了一位回教领袖，马松亭大阿訇，他告诉了我一些非常重要的细节。

马松亭老人和老舍先生是多年的老朋友，友谊可以一直追溯到三十年代初，在济南。抗战时，马阿訇主持重庆大清真寺的教务，并组织回教救国协会，和老舍先生也发生过很密切的交往。应回教救国会的请求，老舍先生和宋之的先生创作了话剧《国家至上》，曾在后方许多地方上演。主演的女演员张瑞芳曾被回民亲切地叫作“我们的张瑞芳”。马松亭老人一九五七年被错误地打成“右派”，思绪低落，生活处境也很凄凉。“文革”初起，老人更是不安，常常闷坐在河边，一坐便是半天。

八月初的一天，他和夫人又来到什刹海岸边，闷闷不乐地坐到黄昏。突然，一抬头，他看见老舍先生独自一人拄着手杖慢慢地沿着岸边迎面走来。马老人拉他一起坐一坐。

老舍先生一开口，就让马老人夫妇大吃一惊。他非常坦率。他说他想不通，很苦闷，要“走”。

“马大哥，咱哥儿俩兴许见不着了！”老舍拉着老人的手，掏了心窝子。面对多年不见的老兄弟，他完全无顾忌，反而能对面直说。

马老人无言以对，站起来和他同行，送了他一程。

老舍先生说：“你们回家吧，我走啦……”

什刹海离家还有一段距离，除非专门来，并不顺脚。老舍先生是专门来的。

他似乎在选择自己的归宿地。

他记得他的刚烈而清白的两位殉难老朋友的选择。

马老人和夫人的回忆使我震惊，当风暴还未刮到他的头上时，他已经做好结束自己生命的一切准备，包括方式、地点。

马松亭大阿訇的回忆实在是厉害，它把老舍之死的谜团里的那最后一点残雾彻底的吹散了。

它说明，投水只不过是最后的一笔，图画的大框架却是早已勾勒好了的。

它说明，人比动物不知道要伟大多少，因为人能计划和安排自己的死。

它说明，就是没有八月二十三日的批斗，悲剧的结局也是注定了的。

它说明，士不可辱和宁折不弯并不能全部概括他的死。



全只因为，他是一个极清醒的人。他看到了灾难，不光是对他一个人的灾难。

他最后选择了太平湖，一个不出名的城外的野湖，是渔民养鱼和打鱼的地方。他对太平湖很熟。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二年，他在这一带当北郊劝学员，专门管城外北郊的私塾，他的办公处便离太平湖很近。这段经历让他日后创作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三十年代，他替老母亲在和太平湖相对应的城根儿里买了一所房子，十间大北房，外加一个大院子。五十年代，北京师范大学在太平湖北面建了新校舍，他在那里作兼职教授，给中文系的学生讲过小说课。这里很安静，没有游人。

老舍先生成了太平湖中第一位殉难者。当天，曾有成百上千的人闻讯而来，消息迅速传遍北城。继老舍先生之后，太平湖成了“文革”殉难者的盛地，连续几日，每天几十人往里跳。

这一切，都是旁人无法替他安排的，是他的本意，有源、有根、有理。

他的好朋友巴金先生、冰心先生还有许多其他的人得知这一消息后，放声痛哭过，国外的文学家率先写了悼念他的文章和小说，瑞典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甚至准备给他颁发诺贝尔文学奖，可是，这一切，他都不知道了，他走了，实现了他的哲学——当发生祸患时，身谏，投水，殉难。

这个悲壮而凄惨的选择，至今，还震撼着人们的心，深深地，重重地，久久地，让一切善良的人们想起来便黯然泪下……并在酸楚中终于明白了他的死的全部份量。

~~~~~  
**【亡灵祭坛】**

文革受难者老舍

• 王友琴 •

**【老舍，作家，本名舒舍予，老舍是其笔名，1899年生，任北京市作家协会主席和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1966年8月23日，老舍和其他28人被红卫兵押到北京文庙“斗争”：跪在焚烧京戏服装和道具的火堆前被毒打三小时。8月24日夜，老舍在北京西城太平湖投水自杀。】**

老舍是个作家，但是他的自杀却难以和历史上任何作家的自杀类比。

老舍在遭到中学生红卫兵“斗争”和毒打以后，仍然面临更多的暴力折磨，他在这种境况下投湖自杀；身为作家，他死前却未留一字遗书；他的尸体被火化后，当局不准留下骨灰。另外，他所遭到的迫害和死亡不是孤立的个案。同一时期，北京有数千人被“斗争”而死——实际是在“斗争”过程中被打死，也有一大批的人象老舍一样在被“斗争”、殴打和侮辱后自杀。

要理解老舍之死，也需要了解：这种暴力性“斗争”如何运作？怎么会在1966年夏天如此普遍地进行？这种有领导的通过“群众”之手来进行的暴力迫害和杀戮的方式，是怎么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老舍在1966年8月23日被拖去“斗争”的时候，和他一起被毒打被侮辱的还有28

个人。这28人之一是老作家肖军。据他记忆，那天被“斗争”的人还有：骆宾基、荀慧生、白云生、侯喜瑞、顾森柏、方华、郝成、陈天戈、王诚可、赵鼎新、张孟庚、曾伯融、苏辛群、季明、张国础、商白苇、金紫光、王松生、张增年、宋海波、张治、张季纯、端木蕻良、田兰、江风。（《肖军纪念集》，第800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0）其中还缺两个名字。这些人都是北京市文化局和“文学艺术家联合会”的作家、艺术家和干部。荀慧生、白云生、侯喜瑞是著名京剧演员，肖军、骆宾基和端木蕻良是作家，赵鼎新是文化局长。

这29个人被红卫兵“斗争”，首先是因为早在1966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明确写了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在这样的理论下，各文艺单位都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绝大多数作家和文艺界领导干部就成为“黑线人物”。对这些人的清除，是对一个群体的清除。军队代表被派往各文艺单位。

在当时的体制下，“作家协会”有一批领固定薪金的“专业作家”。文革打击了一大批作家，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作家都被“斗争”的。在北京作家协会，协会主席老舍“靠边站”了，新成立的“文革委员会”的负责人中，除了军代表，还有作家浩然。他的关于农村“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金光大道》，在文革中成为“突出阶级斗争”和“塑造高大完美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样板之作。尽管老舍也拥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但是老舍的作品和浩然的作品也确实有相当的不同。奖谁罚谁的差别，明确显示了文革在文学领域的取向。

在1980年，笔者两次访问和老舍一起遭到毒打的肖军先生，听他讲述当时发生的事情。

在红卫兵运动掀起之前，一批文艺工作者，就在本单位被“揪”出来了，也在本单位里的会议上被批判“斗争”。与8月之后不同的是，那时他们只被咒骂和当众罚站等等，没有被毒打。

后来发生的对作家的这种残酷的暴力性攻击，和红卫兵运动的兴起直接相关。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写信支持红卫兵。随着红卫兵在各校普遍建立，殴打老师以及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也迅速蔓延。8月5日，北京发生了第一例教育工作者被红卫兵打死的事件。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并且对他献袖章的红卫兵说了“要武嘛”。8月18日大会之后，红卫兵暴力大规模升级。一批教育工作者在学校中被活活打死，而且，红卫兵进入机关和居民住宅，捣毁书籍文物，并且殴打虐待甚至打死和平居民。红卫兵的行为得到了最高当局的热烈支持，这就是为什么在1966年8月23日上午，北京大学和北京第八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学生可以闯到文化局和文联机关，对那里的“牛鬼蛇神”动手施暴。几个女红卫兵用铜头皮带劈面抽打肖军，给他挂上了“反动文人肖军”、“反革命份子肖军”等几块大黑牌子，还在他的名字上画了红色的大叉子，并且把他的头发剪掉。

8月23日下午3点，在烈日下，这29人被一个一个个叫出来，排成一排站在院子里。每叫出来一个人，就在这个人的头上套上一块写着他（她）的名字和罪名的牌子，4点多，这29人被用两辆大卡车，从他们在西城区的机关被运到东城区国子监“文庙”的院子里。那里曾是皇帝时代的最高学术和教育机构，后来成为首都图书馆。

红卫兵在院子里架起了一个大火堆，焚烧戏剧服装和书籍等等，烈焰熊熊。口号声震天响：“打倒反革命黑帮！”“打倒反党份子XXX！”“XXX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

这29人被强迫在火堆前围成一个圈子，跪下来，以头触地。站在他们身后的有数百名红

卫兵。有的红卫兵拿来了舞台道具木刀、长枪和金瓜锤，对他们劈头盖脸地乱打。有的红卫兵解下腰间的军用铜头皮带，狠狠地抽打他们。当时正值盛夏，人们身穿单衣，铜头皮带打下去，一下一块血渍，打得衣服的布丝都深深嵌进肉里。这29人前有大火堆，后有红卫兵，无处躲闪。

肖军说，当他跪在烧书的火堆前，被身后的红卫兵用棍棒和铜头皮带毒打的时候，心中真是愤怒至极。肖军年轻的时候练过武功，他心里想，如果他动手反抗，凭他的功夫，可以打倒十几个人。但是，他看到老舍先生就跪在旁边，脸色煞白，额头有血流下来。他想，如果他反抗，寡不敌众，他会被打死，其他28个“牛鬼蛇神”，包括文弱的老舍先生，一定会跟他一道统统被打死在现场。他不应该连累别人。不要连累老舍先生被打死的念头使肖军压下反抗的冲动，忍受了三个小时的毒打和折磨。

在这三个小时里，没有人出来制止暴行，也没有人打电话报告市里和中央的领导请求制止暴行。因为当时的人都知道，类似的事情正在整个北京城里轰轰烈烈地发生，而这一切都是文革的领导人正在热烈支持的，不可能有上级或者警察来制止这场殴打。

在“文庙”被毒打过之后，这29人被拖上卡车回到文化局机关。老舍被带回到机关，继续遭打。当时在场的女作家杨沫，在三个月后的日记中（《杨沫文集第七卷》，第5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年）追记8月23日的情景道：“在文联楼门前的台阶上，有几个女学生紧围他，询问他，不时还用皮带抽打两下。我们都被迫围绕在这个会场边。当时，我不敢走开，站在旁边，心如火燎。我们中的一位作家还当场站出来，义愤填膺地批判老舍拿了美金。”

老舍当晚又被揪到公安局，半夜才获准回家，并被命令第二日仍去机关接受“批斗”。第二天早上他离开家后，却未去机关。由于老舍没有在机关出现，有红卫兵拎着铜头皮带到他家中找寻。第三天，8月25日早晨，在西城区太平湖发现了老舍的尸体。

文革后，1978年6月给老舍举行骨灰安放仪式的时候，报导文章里说，他的骨灰盒里装着他的钢笔和眼镜。文章没有直接说老舍的骨灰盒子并没有他的骨灰。那时候的这类文章虽然意在给文革的受难者平反，但是说及文革中的一些可怕的事情时，尽量模糊委婉。

1994年，笔者曾经有机会和老舍的儿子舒乙见面，向他询问为什么老舍的骨灰盒子里只有他的钢笔和眼镜。舒乙说，老舍的骨灰当时没有留下来，因为火葬场不让留骨灰。当时，舒乙31岁，他拿着北京市文联开出一封“我会舒舍予自绝于人民，特此证明”的公文介绍信，到火葬场操办了老舍的火葬手续等等。舒乙说，是两个年轻的妇女办的手续。其中一个是梳小辫儿的姑娘，她说，上面有规定，这样的情况不能留骨灰。

笔者曾经询问是一个什么样的“上面的规定”，是哪个权力机关发的文件。舒乙回答不知道，只记得是那个梳小辫儿的姑娘说的。在舒乙发表的关于老舍的多篇文章里，他没有提及这个火葬场告诉他因有如此规定而不准留老舍骨灰的事情。

由于不能获准查阅文革档案，笔者不能确定这是一个写成书面文字的“规定”，还是一个来自文革高层领导的口头命令。但是确实，在1966年8月下旬被打死和被打后自杀的一大批人，都没有留下骨灰。当时北京的红卫兵中流传着一句话：“打死个人，不就是28块钱的事儿吗？”——被打死者的家属被要求付28元火葬费，但是不能要求保留骨灰。比如，从笔者的调查知道，1966年8月27日被北大附中红卫兵打死的中关村中科院气体厂工人陈彦荣，1966年9月8日被打死在校中的北京第25中学教师陈沅芷，他们的家属都交了28元钱，但是都没能得到死者的骨灰。在全北京把事情作得如此一致，这里面一定是有某个“上面的规

定”在起控制作用。希望有读者会提供关于寻找这样一个“规定”的线索。

另外，舒乙告诉笔者，火葬场的那个梳小辫儿的姑娘还告诉他，象老舍这么高地位的干部，被这么处理——指丢弃骨灰，还是第一个。老舍当时除了在文联和作家协会身任高职，还在“政协”任高职。舒乙在《父亲的最后两天》一文（见《老舍之死》一书，第63页，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1987）中也提到这一点。老舍在被“斗争”以前有小汽车和司机接送他上下班，显然也说明他的级别都很高，在这方面，老舍的情况跟上述工人陈彦荣与中学教员陈沅芷有所不同。如果没有一个写成文的关于丢弃骨灰的普遍规定的话，老舍作为一个级别高的干部受到这种对待，应该是由某个高层领导人决定和指示的。但是舒乙似乎没有追究其中原委。

有一种解释说，不准保留骨灰不仅仅是为了进一步打击死者，也是因为技术上不许可。当时北京大批人被打死以及被打后自杀。在8月18日后，死亡人数一天比一天大幅度上升。根据一份“内部”统计资料，在老舍被送往火葬场的8月25日，北京有86人被红卫兵打死，被打后自杀的人数字则不详。第二天，8月26日，被打死的人的数字比前一天增加了百分之五十，高达125人。以后仍然逐日增加。这样，8月下旬每日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已经大大超过了北京的正常死亡人数。大量被打死的人和被打后自杀的人的尸体，成批送往火葬场，尸体上既没有标明姓名也没有作过血迹清洗。火葬场的停尸房爆满。焚尸炉超负荷工作。也就是说，大规模的暴力迫害和杀戮造成了分别焚烧尸体和保管骨灰的困难。

但是技术性困难显然不可能是主要的原因。对这些被害死的人们的高度蔑视，以及进一步迫害他们的恶意，才会有这种不准留骨灰的规定及其实施。在文革当局的逻辑中，这些受害者的生命都可以被用残酷的方式剥夺，对他们的遗体当然也要穷追猛打。就普通人而言，对这些受害者的被虐死都只有容忍接受了，也没有可能再关心如何处置他们的尸体。应该指出，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残酷。在古代，对判处死刑的犯人，也还容许家属收尸筑坟。文革当局的无限权威却一直延伸进了火葬场。文革对个人的迫害一直继续到死后的骨灰。

老舍投湖，因为文革世界已经在肉体上不容他。他已经在前一天遭到了残酷的暴力性的所谓“斗争”；这一天他如果从湖边转去机关，他显然会在那里又遭到毒打，铜头皮带正在那里等待他，整个北京城的打人风，那时正方兴未艾；甚至他死后，这个世界连他的骨灰都不准存放。——在老舍之前自杀的人，已经遭受了这样不准留骨灰的待遇。在这种情况下老舍投湖，而且没有写下任何遗言。他无声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自杀前，他为什么没有写下遗书呢？难道他死得心甘情愿，或者自惭形秽，故而不置一词，黯然离世？他一生写作，笔头很勤，是个多产作家。以文字表达想法，是他的职业。在他生前，大概是日日动笔的。他在8月24日早晨离开家的时候，身上带有笔和纸。有人看到他投湖以前在湖边坐了一整天。也就是说，他是有时间也有纸笔可能写下遗书再自杀的。他不是没有能力表达自己的失望、愤怒或者抗议的人，但在自杀前却没有写一个字。是因为在精神上，他也觉得已经完全走投无路了吗？结束自己的生命，是一个人能作的最为惨烈的事情。使用文字对作家老舍却是一件驾轻就熟的事情。老舍不写遗书而死。在1966年8月的恐怖中，用文字表达自己的看法甚至变成了比死亡更为不易之事。

中外文学史上都有一些作家自杀的例子。自杀的作家，有的是因为要表明自己不愿意和世界同流合污，有的是因为要抗议人间不平之事，有的是因为厌恶已有的生活方式。作家自杀有各种原因。然而，像老舍这样，年老，腿残，投湖前在肉体上被严重打伤，在心理上被压抑到连一字遗书都不能写，这样的作家自杀是史无前例的。这样的迫害也是前所未有的。

文革结束后，老舍得到平反，而且得到社会的高度礼遇。他的朋友和家人，发表了一批回

忆和纪念他的文章，但是都没有提到老舍在1966年8月23日被“斗争”被毒打之后和自杀之前，对他身受的暴行有何评说，也没有提到他对自己在8月23日之前受到的批判的反应，也没有提到他对于在他之前身受迫害而自杀的相识者与同行的死的评论。其中的原因可能是两方面的：老舍没有说过适合于发表的话，或者他说了但写纪念文章的人认为不应该写出来。

巴金是老舍的老朋友。他在《怀念老舍同志》一文中说，1966年7月10日，他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见到老舍。需要说明，这个时候，北京的历史学家和作家吴晗等人已经在报纸上遭到猛烈攻击，吴晗已经被涌入他家中的学生侮辱和殴打；这个时候，北京的学生已经一个多月不上课，专在校园里开会“斗争”一大批教育工作者。当时人民大会堂是不准许普通人参观的，所以能进入大会堂就是一种身份和政治地位的表现。巴金在文中写道：“我到京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一个多月，没有听到人提老舍的名字，我猜想他可能出了什么事，很替他担心，现在坐在他的身旁，听他说：‘请告诉朋友们，我没有问题……’我真是万分高兴。”（该文收于巴金《探索集》中，见《巴金全集》，第16卷，15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老舍的儿子舒乙在《父亲的最后两天》中说，老舍在8月23日被“斗争”以后，深夜回到家中，告诉妻子：“人民是理解我的！党和毛主席是理解我的！总理（指周恩来）是最了解我的。”（见《老舍之死》，第61页，国际文化出版社，1987）

可以理解，巴金和舒乙都是想为老舍说好话的。然而，从巴金和舒乙的见证来看，在1966年7月和8月，眼看着文革对一大批人的严重的迫害，眼看着毛泽东和周恩来热情支持红卫兵（老舍被打发生在毛泽东接见百万红卫兵并戴上红卫兵袖章五天之后），眼看着他人和自己受到暴力摧残（在老舍被打和自杀之前，已经有一大批人被打而且已经有人被活活打死），老舍非常看重的仅仅是“我没有问题”，以及希冀毛泽东周恩来能对他网开一面。老舍已经接受了文革的这一套，只竭力想在文革的思想框架里面为自己撇清。当他的身体遭到残暴对待的时候，他的精神的关注也已经被文革的巨轮碾压榨干而只剩下他自己“有没有问题”和最高权力者对他的态度。当时老舍的全部焦虑就在于此吗？他还有别的关怀吗？老舍的这种精神状态，像他的死一样令人叹惜。

关于老舍死前的心态的形成，文革的时代背景固然是重要因素，也可以从他以前的思想轨迹中发现原因。老舍被“平反”后出版了《老舍写作生涯》一书，其中收录的都是老舍写自己生活和创作的文章。这本书的“内容简介”说：“本书既可以当作老舍先生的自传来读，又是研究老舍的可贵资料。”这本书中有一篇老舍写的题为《新社会就是一座大学校》的文章，最初发表在1951年10月1日的《人民文学》上。该文主要部份照录如下：

在过去的一年里，社会上每一天，每一小时都有使我兴奋与欢呼的事情发生；我说哪一件好呢？

最后，我下了决心；不能老拿不定主意啊！就说前天在天坛举行的控诉恶霸的大会吧。

会场是在天坛的柏林里。我到得相当早，可是林下已经坐满了人。

开会了。台上宣布开会宗旨和恶霸们的罪状。台下，在适当的时机，一组跟着一组，前后左右，喊出“打倒恶霸”与“拥护人民政府”的口号；而后全体齐喊，声音象一片海潮。人民的声音就是人民的力量，这力量足以使恶人颤抖。

恶霸们到了台上。台下多少拳头，多少手指，都伸出去，象多少把刺刀，对着仇敌。恶霸们，满脸横肉的恶霸们，不敢抬起头来。他们跪下了。恶霸们的“朝代”过去了，人民当了家。

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一一的上台去控诉。控诉到最伤心的时候，台下许多人喊“打”。我，和我旁边的知识分子，也不知不觉的喊出来。“打，为什么不打呢？！”警士拦住去打恶霸的人，我的嘴和几百个嘴一齐喊：“该打！该打！”

这一喊哪，教我变成了另一个人！

我向来是个文文雅雅的人。不错，我恨恶霸与坏人；可是，假若不是在控诉大会上，我怎肯狂呼“打！打！”呢？人民的愤怒，激动了我，我变成了大家中的一个。他们的仇恨，也是我的仇恨。我不能，不该，“袖手旁观”。群众的力量，义愤，感染了我，教我不再文雅，羞涩。说真的，文雅值几个钱一斤呢？恨仇敌，爱国家，才是有价值的、崇高的感情。

这不仅是控诉了几个恶霸，而是给大家上了一堂课。这告诉了曾经受过恶霸们欺负的人们：放胆干吧，检举恶霸，控诉恶霸，不要再怕他们！有毛主席给我们作主，我们还怕什么呢？检举了恶霸们，不单是为个人报仇，也是为社会除害啊。这告诉了我，和我一样文文雅雅的人们：坚强起来，把温情与文雅丢开，丢得远远的；伸出拳头，瞪起眼睛，和人民大众站在一齐，面对着恶霸，斗争恶霸！

恶霸们并不是三头六臂的，而是在我们面前跪着，颤抖着的家伙们。恶霸们不仅欺负了某几个人，与我们无关；他们是整个社会的仇敌！

一个卖油饼的敦厚老实的老人控诉恶霸怎样白吃了他的油饼，白吃了三十年！

.....

（自《老舍写作生涯》247—249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

老舍的这篇文章，令人震动和深思。

首先，老舍自己在死前身受的那一场文庙“斗争会”，活脱脱就是15年前他描写的这个“控诉大会”的翻版。两个会有同一个模式：都是群众大会；都是事先已经定好了被斗者的罪名；被“斗争”者都一开始就跪在地上；开会后，都先喊口号煽动情绪；所谓“揭发控诉”，都不用法律的标准来衡量，也不准被斗者说明和辩护，只是煽起仇恨；到高潮处，与会者高喊“该打该打”，就开始对被斗者使用暴力。

老舍写的这个“控诉恶霸”的会，不但和他自己所遭受的那个斗争会模式一致，甚至连细节都相仿。在老舍描写的斗争会里，他写出的被斗者的唯一的具体罪行是“白吃油饼三十年”。这样历时漫长的一个故事，应该到法庭上去仔细说明，才能决定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但是在“斗争会”的气氛中，只听单方面的话，不问细节，不讲法律准则，一片喊打之声之后就实施暴力攻击，老舍还觉得理所应当，并无不安。在老舍自己被“斗”的故事里，则是“斗”他的人说他“拿了美金”。这该是指他1946年接受美国国务院的邀请访问美国，这种访问是邀请方面提供旅行花销的。老舍也曾发表关于他的美国之行的文章。这一访问不是秘密，完全可以说清楚是什么性质的旅行。但是，我们从杨沫所描写的1966年8月23日在北京文联楼门前台阶上的“斗争会”，可以看到老舍在红卫兵的皮带毒打下是有口莫辩的。因为他是北京作家协会的主席，他也确实被攻击为“文坛恶霸”。

在这篇文章里，老舍不但写出了“文雅值几个钱一斤”这样的“新理论”，而且还把他自己

从“文文雅雅”变成高声喊“打”的过程一步一步写了出来，很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种斗争会的心理机制。他所经历的，可能就是15年后毒打他的一些中学生红卫兵所经历的。从他的自述中，我们看得到人的暴力行动怎么被合理化，人的从众心理怎么被利用，人的仇恨怎么被煽动起来。这套方式相当有效，显然成为文革中“批斗会”仿效的模式，并且更为系统化。

当然，最让人难过的是，1951年老舍描写这种“斗争会”的时候，他热情满怀，不加思考。他为这样的新的生活形式叫好。这种新形式是新的社会制度的重要结构部件之一。这种“斗争会”在实践上和理论上后来都一步一步发展，到了文革时代，登峰造极，时时处处实行。文革十年，几乎每一个人不是“斗”过别人，就是被别人“斗”过。这种“斗争会”违反法律程序，激发人的非理性，鼓励暴力虐待，是一种对人的迫害。这种形式的发明是一种可怕的发明。老舍归根到底是一个受害者，但他曾经参与接受、确认和颂扬这一最终害死他的机制。

读了老舍这篇《新社会就是一座大学校》之后，笔者倒宁愿设想，老舍投湖前一整天在湖边思想的，不是最高权力者对他理解与否，或者他自己“有问题”与否，而是别的一些焦虑，比如，为他在15年前写的赞美那种“斗争”方式的一篇文章感到的自责。15年来，他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这类“斗争会”：先是“斗争”他不认识的人，如1951他在天坛参与“斗争”的“恶霸”；然后“斗争”他的同事和熟人，如1957年被划为“右派份子”的一批作家；最后，“斗争”来到他自己身上，而且，这一次的“斗争”比从前的更为残暴更为系统，逼迫他选择了死亡，而不是活着被继续“斗争”。在他投湖之前，他应该对这种反法律反人道的“斗争”及其代表的哲学有所思考和分析，或许也感到了惭愧，毕竟这一次他不幸不能再做一个在“斗争会”上跟着主持人喊“该打该打”的人了。他在死前能够意识到自己曾经失去了理智、良心和道德感吗？

□ 原载《民主中国》2001年第六期

~~~~~

## 【抢救历史】

### 《老舍之死》：对历史的激情与沉思

• 郭小聪 •

《太平湖的记忆——老舍之死》是一部难得的采访实录，作者是一对年轻夫妇。多年来，他们穿行在从未亲历过的文革初期的历史氛围中，逐一采访了与老舍之死直接有关的1966年8月23日北京市文联批斗事件中的几十位当事人。在文革发生三十五年后，这本书无疑具有特殊的历史抢救意义。作者采访到了端木蕻良、浩然、杨沫、草明、林斤澜等一批老作家；对于老舍之死，他们有的人欲言又止；有的人似乎难辞其咎；有的人在接受采访后不久就故去了，因而成了最后的遗言。更为可贵的是，作者还转辗找到了当年在太平湖发现、打捞老舍遗体的渔场职工、派出所片警和围观者；成功地采访到了当年8·23事件中一个带头打人的中学女红卫兵头头，经过诚恳的努力，她终于同意开口话当年，然而即使她也是五十开外的人了。

为了探寻真相，作者每次采访都做了充份的准备，力求提出的问题坦率，准确，不容回避。他们还通过向采访者们问同样的问题，辨别他们的不同态度；或者通过转述其他当事人的看法，使之形成间接的交锋、对话。但是，两位作者惊讶地发现，历史学也许确如汤因比所说，“不可能是物理学或化学那种意义上的科学”，深受人的因素的制约。尽管所有被采访者都对老舍之死感到惋惜，对他的人品和才华表示钦佩，对那场文革浩劫深感痛恨，可是当他们打开自己的记忆之门时，他们陈述的事实如此不同，出入如此之大，叫人更觉扑朔迷离，以至于老舍之子舒乙惊呼道：“我觉得很尴尬。没过多少年，历史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幸亏我这个见证人还在呀！……”

这才几十年，就这么混乱了。再往后怎么搞得清楚！”

但是，在纷繁复杂的历史线索背后，两位年轻的作者还是逐渐触摸到了更为厚重的文革时代所特有的疯狂而恐怖的整体氛围，它就保存在被采访对象的记忆里，语气中和情态中，既无比真实又不易把握。作者发现，不管是当年的受害者还是加害者，几乎所有人都显得心事重重，若有所思。不少人表示采访前要做认真的准备；有的人要求在书中附录他提供的全部材料；有的人犹豫再三；有的人彻夜难眠。可奇怪的是，无论问题怎样尖锐，采访过程怎样艰难，所有被采访者对这两位年轻作者的态度都是温和的、友好的，甚至可以说是相当敬重的。可是他们为什么要在后生晚辈面前如此慎重呢？难道两位业余的社会历史研究者会比当年的专案组更叫人不安吗？不，不是，这正是上一代人所特有的历史感。他们已是风烛残年的老人，比起揭开往日的疮疤，他们更怕自己心中的“历史真相”被永远埋没了；他们更希望给未来留下一个自己的说法。他们知道被采访的内容将成为未来历史的一部份，而面前这两位年轻的采访者就像是未来的史官，在他们背后是一代代密密匝匝的好奇的眼睛，这其中也有自己的后代。而让他们抱有好感甚至敬重的是，两位年轻的作者与过去没有任何恩怨，却如此认真执著，义无反顾地担负起抢救历史的责任，这是一种高尚的使命感。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任何想掩盖歪曲历史的意图都显得越来越没道理，而只有主持正义、秉笔直书的善良愿望最持久。

这本采访实录不仅搅动了上一代人的心弦，事实上也逐渐丰富了这对年轻夫妇的内心生活，改变了他们的精神气质。从采访过程中可以看出，作者的身心已经完全融进去了，从最初的好奇、超然到被感同身受的情感所激荡，这不仅使他们更加意识到了“历史的责任感”，自己的心灵也受到净洗和升华。书中最精彩和富于个性的一个部份，应该是每篇采访正文前后的附笔。这些附笔不仅交待和介绍了采访情况和采访对象，而且还时时激荡不已地流露出作者的真实感触，有些片断是像散文诗一样短而诚挚，优美而深切，一点也没有浮躁虚飘之感。例如在采访萧军女儿夫妇之后，他们这样道出自己的感受：“这是最令我感动的一次采访，泪水难以控制地流了出来”。当他们走在夜晚繁华的大街上，感到无法融入其中，因为他们刚刚穿行在历史的苦难之中，在那样艰难的时刻遇到了美好的人和事，这是多么高贵的情怀和英勇的人生，他们体验到了苏格拉底所说的：“逃避死亡并不难，而逃避堕落才是最难的”。作者崇高的感动最后静静地变成了誓言：“这次采访使我们增添了勇气，义无反顾地去继续做更多我们认为有价值的事情。”是的，在人世间，无论什么时候，唯有正义的情感最坚韧，唯有向善之心最宁静。

这本采访实录更深层的意义是，通过探讨老舍之死这一旧案，促使大家对文革中大量存在的“非正常死亡”现象引起思考：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在光天化日之下、众目睽睽之中惨遭不测？为什么这么多人被逼上自杀的绝路，家破人亡？为什么一年一度在天安门前跳孔雀舞的女孩子，一夜之间会变成没有人性的打人凶手？老舍说在动乱中死去的往往是刚烈而清白的人，那么这种生命的逆向淘汰又会对民族精神、社会伦理产生什么样的负面影响？有人说，巴金倡议的“文革博物馆”如果能够成立，那么“非正常死亡”现象将成为其中一个重要部份。可是这一倡议至今没有着落，连当年可怕的记忆和巨大的问号也似乎烟消云散，但这本采访实录如同岩石般的存在，使人们再一次意识到，当年多少像老舍先生一样的冤死者仍在另一个世界等待答案和公正，这使我们所有活着的人无法保持沉默，更不能在沉默中遗忘。而这本书还提醒人们，那些曾经造成过民族浩劫的错误观念，无论说的多么动听，都不应再给它们第二次机会，这是历史的教训，也应是人民的选择。

在本书中，两位年轻的作者表现出深切的历史感，他们认为，深究历史应有助于更好地改善人类生活，但它不应是为了任何抽象的人群，而应是以所有活生生的人为目的。当他们置身于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看到那些上了年纪的人就会不由自主地想，他们当年在文革中扮演过什么角色？目睹过怎样的人间悲剧和人性扭曲？而他们这一代人的“阅历丰富”又对个人和民族有什么益处和荣耀？作者最终以年轻一代的宽容之心反思和告别了那一页历史，而寄希望于将



来，下面这段感想是充满了高贵的情感和理想色彩的：“无论当时他们是正义的维护者，还是永不光彩的背叛者，如果这件事和制造它的时代根本没有出现过，他们将永远没有那些隐痛，他们的心肯定比现在要健康，且更有生气，更纯洁。所有被推上生活舞台的人都是历史的受害者，尤其是险恶的历史。”是的，为什么我们的历史非要险恶残酷地考验人性，使每个人的身心都不免伤痕累累呢？为什么我们不能从此共同致力于一种较为单纯平静的社会生活和文化氛围呢？为什么天上的彩虹就永远不能取代地上的泥淖呢？正是怀着这样的激情与企愿，作者以又一代年轻人的乐观口吻面对生活：“它使我们敢于蔑视这个卑微的尘世，同时又对它无限关切、眷恋。”

□ 原载《中华读书报》（《太平湖的记忆——老舍之死》，郑实、傅光明编著，海天出版社出版）

~~~~~

### 【研究笔记】

1966年8月23日：一个“罗生门”式的历史圈套

• 傅光明 •

在调查“老舍之死”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口述历史”往往只是一个个圈套，每一次谈论都是在无意识地接受谎言或传播谎言。事隔多年，人们已经按照自己的想象和主观意愿重新组合、编排、过滤了历史。

写史的目的，无疑是为保存某一段历史的真相，传之后人，警惕将来。我们常说，“读史明鉴”，“忘记历史就意味著背叛”，“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什么的。其实，归结为一句话就是，“谁掌握了历史，谁就掌握了现在”。这是英国作家、《一九八四年》的作者乔治·奥威尔所说。但我从调查采访“老舍之死”的历史中得到了什么呢？说来可笑，我被历史搞糊涂了。

我越来越发现，我们无法还原历史本真。像老舍，倏忽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连骨灰都没有留下。迷雾一样的历史仿佛裂开了一道缝，把他永远沉入了黑暗，留下的只是版本不一的各种猜度。

我们只知道他在死前经受了突然的暴力和侮辱。紧接著，便在太平湖发现了尸体，竟没有留下只言片语。没有人知道这位曾在小说中多次为善良人物安排投水自杀结局的老人，在死前经历了心灵和肉体怎样巨大的双重苦痛。与“文革”中许多类似事件一样，这个悲剧也成了独角戏。由此我想，实际上我们许多时候所说的历史都是“无物之阵”。

“历史”其实只是个很抽象的名词，并没有具体的意义，它要鲜活起来，立体起来，就得靠时间和事件的挂钩。英国著名艺术史家贡布里希在他的《艺术的故事》中说：“日期是不可或缺的挂钩，历史事件的花锦就挂在这个挂钩上”。就“老舍之死”而言，事件就是历史的挂钩。我们把自己对历史、对人性的认识悬挂在上面。无论后人是否理睬这些也许会风干的“花锦”，但它们的的确确是我们所能留下的并不太多的真实的历史印记。我们所有寻找见证人的过程，都已经和1966年8月那个悲惨的日子挂在了同一个历史的挂钩上。

“戏说”历史无疑是在帮著历史设圈套。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作家是史学家的天然敌人。他经常是经过文学的加工把历史给神话化了。另外，不幸的是，我们又常习惯于为了后人今天的现实目的而重新塑造历史。正如美国汉学家保罗·柯文所说：“在所有把过去加以神话化的具体例子中，重点都不在于过去确实发生了什么事，而在于它被后人为自己的目的而如何加以重新塑造。神话化的过程是：认定过去中某特定的主题，把它简单化，加以夸张和渲染，直至变成今人力量的源泉，足以使现在和过去强有力地相互肯定，互相印证。被利用的主题可能是真

实的历史过去的一部份，但也可能不是”。

甭说作家笔下的历史绝不是信史，史学家的历史就真的重建了历史上的过去吗？我当然知道，细节的真实决不是全部历史；历史的真实与真实的历史并不是一回事；白纸黑字未必是信史；真正的历史往往在文字背后；“纯客观”的编年叙述并非就是接近历史的真实，等等。

历史既然是由人来写的，人性的弱点当然就会不经意甚至是刻意地渗透进历史，人写的历史也就由此带上了人性的弱点。就是说，历史的叙述者与历史的记录者之间，存在著历史的“真空”。这是研究口述历史要特别注意甄别的。《太平湖的记忆——老舍之死》我觉得算得上是纯粹意义上的口述历史。

历史有绝对真实的吗？我不敢妄自置喙。只要我们别有意制造“真空”的历史，就已经是历史的幸运了。接受了传统正规教育的我们，深知作为概念来传授和叙述的历史与历史本身的差距。美国著名汉学家列文森在其《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说，我们的“历史学家的历史并非这些历史学家所能写出的历史。他们所研究的历史与他们研究出的历史并不能完全符合。”

他的话多少反映出我们被灌输的概念化历史有多么苍白无力！尤其当我们把当事人的叙述与此前的文献比较时，更深深感到我们头脑中的历史是何等幼稚。它只不过是按照自身需要组合起来的拼图游戏，或者是仅供人们饭后谈资的随意杜撰。单从这点上可以说，被人们约定俗成所叙说的“口述历史”，往往只是一个个圈套，每一次的谈论都是在无意识地接受谎言或传播谎言。而我们生命的有限性又决定了你无法去戳穿它们。所以，我们无形中已经将“老舍之死”的采访调查当成了挣脱圈套和寻求生命真实的努力。

可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这一圈套却出乎意料地导致了我们对历史真实的怀疑。为了使采访更可靠，更接近事实本身，我们在采访中刻意注重对细节的追询。结果事与愿违，相互矛盾的叙述反而使我们手足无措，有时甚至是瞠目结舌，并不遥远的事件变得更加扑朔迷离、错综复杂。

个人有个人的立场，个人有个人的动机。我们将永远不知道哪一种叙述更接近事实本身。当然，这并不是说，不存在惟一的、真正的真实，或者追求真实的努力永远徒费无益。相反，假如真实是人类不可及的神迹，那我们所要和正在做的便是无限近地趋近事实，并尽最大努力以此来反抗历史叙述中的暴政和人类认知的有限。

当然，即便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书中当事人的叙述都属于口述历史的范畴。口述历史无疑是活的史料，也正因为其“活”，叙述者才越发强调它的真实。而这真实又“活”无对证，似乎就成了绝对历史。如果这样想，便上了历史的当。

法国哲学家保罗·凡纳指出，事件永远不可能和事件的参加者及目击者的感知相吻合；而史学家正是要从证据和文件中刻画出他们想塑造的那个事件。若果真如此，史学家也有了创造神话的可能。

我们不想制造“神话”，也不想把“老舍之死”仅仅尘封在历史的博物馆里，作为陈列品供人们欣赏，而要使其成为现在发展著的历史的一部份。也就是说，不把“老舍之死”作为“过去时”标本的“历史遗产”，而要作为“现在时”甚至“未来时”活生生的历史生命。因为在我们看来，“老舍之死”将具有恒定持久的思想文化价值。

现在研究历史，细节的考证和精细的描述，较之以前人们注重的整体判断和一般性综括，已显得更为重要，更为真实。人们正学会接受科学的“历史的”诠释，而不再仅仅认同意识形态武断的“文化的”诠释。人们开始更多关注历史的具体性、复杂性、多面性和处于不停顿的发展变化中的过程性。

今年是鲁迅先生诞辰120周年，老舍先生逝世35周年，他们这一“生”一“死”的生命方式，都是留给20世纪中国文坛和思想文化界的精神宝藏。研究鲁迅先生“生”的论著和文章可谓汗牛充栋，而研究“老舍之死”的论著却连一本也没有。我目前所做的还是在为写一部研究“老舍之死”的专著做资料上的准备，想先心平气和地寻觅这件史实的公是公非，不带曲笔，不带感情色彩地先把事件本身闹清楚。但我私下有个野心，想把这部书写成我心中仰慕的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列文森、孔飞立笔下的“史著”。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这个本事，也许只是好高骛远。

□ 摘自《光明日报》

~~~~~

## 【人物追踪】

### “奇迹”浩然面面观

• 袁良骏 •

自从去年浩然先生自称“是一个奇迹，亘古未出现过的奇迹”之后，文学界颇引起了一点反响。公开发表的争议文章虽然不多，但背后的议论却相当不少。浩然算不算一个“奇迹”？如果算，“奇”在哪里？浩然说：他“这个奇迹的创造者是中国农民”，那末，如何看待他和中国农民的关系？浩然还说：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对社会、对人民是有贡献的”。那末，他当时的“贡献”何在？浩然又说：他对自己在“文革”中写的《金光大道》、《西沙儿女》等作品，不仅不“后悔”，相反，还为它们“骄傲”，他“最喜欢”也最骄傲的是被人们批评为极左文艺路线化身的《金光大道》。那末，又如何看待浩然的这些作品呢？凡此种种，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一个小说家的自我评价，而牵涉到“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评价，牵涉到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评价和今后发展的大问题。因此，我们不能不关注浩然这个自封的“奇迹”。

#### 一、关于所谓“奇迹”

姑且不谈“奇迹”的内容，我们不能不首先“敬佩”浩然的勇气。在上下五千年悠久的历史文学史上，自封“奇迹”的作家从来没有，浩然是开天辟地第一份。从这个意义上说，浩然的确创造了一个“奇迹”，一个大言不惭、自我吹嘘、自我膨胀的奇迹。这种“勇气”，从屈原到鲁迅，没人有过；而今而后，也未必再有。浩然很可能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奇迹”。然而，小学生也知道，自我吹嘘得再厉害，也不能算是什么奇迹。那么，浩然的“勇气”是否可嘉呢？也不然。古人云：“知耻近乎勇”。自我吹嘘、自我膨胀一向被中国人视为耻辱。浩然先生的自封为“奇迹”，按照中国的古训，就得算“不知耻”，离真正的“勇”，就远哉遥遥了。

浩然年轻时，本来是一个相当谦虚谨慎的作家。他的《喜鹊登枝》、《杏花雨》等小说，虽然手法比较稚嫩，内容上也不无“左”的痕迹，但总的说来，含香带露，充满了朴素的农村生活气息，深得广大读者喜爱并很快成为一名“专业作家”。浩然是一名京东农村的穷孩子，他只读过三年半小学。从这样一名“准文盲”成长为专业作家，确乎有一点旧俄作家高尔基的味道，有点“奇迹”的味道。但“奇迹”不“奇迹”不能自封，而只能由社会、由读者评说。即使你真是一个“奇迹”，让你自己一张扬，就变成了“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一点“奇迹”也没有

了。

更何况，浩然自封“奇迹”，主要含义并不在此，而是炫耀他在“文革”中的“成就”和“贡献”呢？

## 二、关于所谓“贡献”

“文革”中，由于“四人帮”的极左路线，造成了政治上阶级斗争的扩大化，打“派仗”、揪“黑帮”，人民群众自相残杀，也造成了无数冤、假、错案；经济上则生产荒废，市场萧条，人民生活水平低下，整个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而在文化艺术上，则“八亿人民八个样板戏，浩然走在金光大道上”，最应生机勃勃的文化艺术事业也几乎被扼杀、被窒息了。谈论一个人在“文革”中的“贡献”，离不开这个大背景，对浩然自然也不例外。十年“文革”中的浩然，似乎经历了这样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前六年（1966—1972），浩然出于对共产党、毛主席朴素的阶级感情，拥护“文革”，并“出于自己创作的冲动和激情”（浩然语），写出了长篇小说《艳阳天》、《金光大道》和一些短篇小说。这一阶段浩然的主要贡献是写出了《艳阳天》和《金光大道》。第二阶段为后四年（1973—1976），由于《艳阳天》和《金光大道》受到了“四人帮”特别是江青的青睐，浩然平步青云，由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作家一跃而成为江青的大红人，拟议中的文化部副部长（未及宣布），江青座上常客和“钦差大臣”。1974年被江青“亲自委派”到西沙群岛前线视察，一路风光，回京后写出了《西沙儿女》（诗体长篇小说）。后又奉江青之命视察大寨并写成《大地的翅膀》（报告文学）。这一阶段，浩然对“四人帮”贡献巨大，可以说是一位“得天独厚”的“帮闲文人”。如果不是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浩然的前途不可限量，岂止区区文化部副部长而已。

因为我们并不了解浩然追随江青、“奉天承运”的内幕，我们根据的只能是见诸文字记载的浩然的“外在表现”。这个“外在表现”能否代表浩然在“文革”中的全部“贡献”，实在把握不大，但仅据这个“外在表现”，我们即不难看出：浩然所吹嘘的他在“文革”中的“贡献”，实际上是一种犯罪和出丑。“四人帮”祸国殃民，罪恶滔天，江青尤飞扬跋扈，令人发指。浩然成为他们的亲信和“御用文人”，为他们东奔西走，替他们摇旗呐喊，这不是一种犯罪行为？对得起被他们整得死去活来的广大人民（主要是农民）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当然，浩然可以为自己辩解，说当时他们代表自己热爱的中国共产党，自己“上贼船”是不自觉的，情有可原的。然而，为什么当时那样炙手可热、不可一世呢？廿年后的今天为什么还要把这段并不光彩的历史吹嘘成“贡献”呢？莫非为江青卖命也算贡献？为“十年浩劫”摇旗呐喊也算贡献？浩然小说家的良知到哪里去了？所以，浩然吹嘘的“贡献”只能被江青及其一伙认可，广大人民群众只能是嗤之以鼻的。

## 三、关于《艳阳天》和《金光大道》

在浩然自吹自擂的“贡献”中，自然不能不包括这两部他引为“骄傲”的长篇。说实在话，浩然所以被江青一伙所赏识和利用，关键就是靠的这两部长篇。江青一伙欣赏这两部长篇的什么呢？简言之，不外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两部小说写的都是“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即所谓农村合作化、人民公社化，表现了所谓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第二，两部小说都表现了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复杂性”：地主、富农等阶级敌人的破坏，党内外保守势力（或曰“资本主义势力”）的阻挠，工作中的缺乏经验和失误、挫折；

第三，两部小说都塑造了“高大完美”的新农民英雄形像，《艳阳天》的主人公萧长春、《金光大道》的主人公高大泉就是他们的杰出代表。

如果五、六十年代中国农村的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真是什么“历史的壮举”，浩然的这两部小说自然会“垂芳千古”。遗憾的是，历史已经证明：无论是合作化还是公社化，对五、六十年代生产力极其低下的中国农村来说，都是一种极其可笑的“左倾幼稚病”。正因为它幼稚可笑而又强制执行，所以它才造成了整个农村、整个农民乃至整个中国的巨大灾难。1958、1959、1960三年人民公社化、“大跃进”的高潮期，中国农村成了一种什么景象？多少农民父老兄弟啼饥号寒乃至含恨死去？作为农民的儿子，浩然对此究竟是一无所知还是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呢？不客气地说，浩然的这两部长篇，完全是“左倾幼稚病”的产物，书中描写的所谓“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完全是虚假的、人为的、违反中国农民的心愿和根本利益的。对此，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做出了科学的历史结论，改革开放二十年来中国农村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充份证明了这个结论的正确性。

我们并不否定浩然创作这两部长篇小说时的激情和虔诚，显然，他是全心全意讴歌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他当时并非“奉命创作”。而且，他对农村也是高度熟悉的，小说的某些细节、场景乃至人物形像（比如“滚刀肉”之类）也有其真实可信的一面。然而，两部小说的致命伤就在于歌颂了极左路线，歪曲了农村现实，违背了广大农民的利益和意愿。说白了，浩然跟得太紧了。他把错误路线当成了金科玉律，写成了中国农民的命根子，大错而特错了。其次，从人物塑造上说，两部小说的主人公都太高大完美，特别是高大泉，更被写成了灵光四射的“完人”。而他的全部业绩无非是带领农民走合作化、公社化道路，实际上是让广大农民勒紧裤腰带向共产主义“穷过渡”。如此一来，高大泉再积极、再光辉、再高大，又有何用？又有何益？这种极左路线哺育的极左英雄，怎能不随着极左路线的垮台而垮台？高大泉“文革”中成为江青一伙文艺创作“三突出”原则（突出正面人物、英雄人物、主要英雄人物）的样板不正是顺理成章吗？

究竟五、六十年代的农业合作化、公社化是否错了？是否极左路线？浩然显然是有保留的，不服气的。这是他的权利。但是，有保留、不服气是一回事，客观现实、客观历史又是一回事。不说别的，仅就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而言，究竟是改革开放以来有所改善还是合作化、公社化时有所改善呢？如果不是改革开放，仍然是公社化时的“一大二公”，农村将凋蔽破败到什么程度，难道可以想象吗？时至今日，浩然仍在为他的《金光大道》、高大全而“骄傲”，实在“骄傲”得莫名其妙。如上所述，无论从思想上还是从艺术上，这两部长篇都是不能成立的，它们已经被钉到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它们不是毫无价值，但却只具有“反面典型”的意义。从五、六十年代过来的浩然的同龄人可以透过小说重温那段荒谬可怕而又滑稽可笑的历史；年轻朋友也可以由之增广一点历史的知识。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 四、关于“过而能改”

古人云：“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浩然尽管在“文革”中曾被江青一伙所利用，尽管他歌颂过极左路线，但这些都有一定的历史背景，不能也不应完全由他个人负责，不能也不应抓住他的这些历史小辫不放。历史在发展，时代在前进，中国共产党已经纠正了自己历史上的“左”的错误，作为不同程度上受过这种“左”的影响的个人，更应该放下包袱，轻装前进。遗憾的是，浩然的包袱太重了。他的“奇迹”——“贡献”——“骄傲”之类一系列看似荒唐可笑的自我评价，正是这种历史包袱的“外泄”。浩然的刚愎自用，并非他的本色，而是一种对历史的愤懑的抗争。浩然的潜台词是：究竟谁对谁错，我们走着瞧！

是的，廿年太短，还要继续走着瞧。但我们不能不诚恳相告浩然先生：老站在极左路线的

观点、立场上，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是很难有一个客观、公允的评价的；对自己的历史功过，也是无法有一个清醒认识的。

毛泽东同志虽然犯了“文化大革命”这个危害巨大的错误，但他毕竟还是一代伟人，他的很多话还是值得我们认真领会。他曾不止一次地告诫犯过错误的同志：“放下包袱，轻装前进。”不知自奉忠于毛主席的浩然先生，能否从毛主席这个历史的忠告中得到启悟。

只有告别过去，才能继往开来。我们希望浩然先生不要再在“金光大道”上顾影自怜、“笑傲江湖”，我们希望读到浩然先生为改革开放、扭转乾坤的中国农民树碑立传的伟大新作。

□ 原载《中华读书报》1999年8月25日

~~~~~

### 【往事追忆】

#### 红卫兵小报和我（十二）

• 周孜仁 •

#### 14，革联会，从迷乱走向明朗

《山城战报》本为三日刊，从4月1日出版第六期前，都非常准时，第七期却推至五天后的6日才出版，而且这一期简直就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内容，完全是和重庆具体问题毫不沾边的、空空泛泛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的消息和文章，甚至非常铺张地用一个多版面开始连载反刘少奇的先知先觉者陈里宁的《狂人日记》。这个长篇日记很玄乎，谁也不知真假，唯一的好处就是长。在编辑部思想混乱、不知何云的时候，用这种文字垃圾占领版面实在是最佳选择：既符合大方向，又不必向读者表明自己对现实问题的态度。

革联会原定4日召开的工代会——这次大会是革联会计划中让重庆社会秩序正常化的一个重要步骤——被无限期推迟后，六日和七日，连续用两天时间召开了一个全市革命造反派负责人的联席会议。开会的同一天，革联会发布了《关于目前重庆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几个问题的通告》。4月10日出版的《山城战报》第八期用头版全版刊登了这个文件。而三天后出版的第九期则在第二版刊登了联席会议的消息。从这个通告和这个会议的召开，可以看出保革联派通过一番折腾，对自己的思路已经基本理出了头绪。四月六日《通告》共谈了八个问题，（一）斗争的主要任务（二）关于革命的“三结合”；（三）正确对待革命群众组织；（四）正确对待革命小将；（五）关于镇反工作；（六）关于夺权中的问题；（七）关于保守组织；（八）抓革命促生产。《通告》的基本立场和对一些实质性问题的看法，在警备司令部三月二十六日《公函》的基础上，又有所前进，并且表述得更加明晰具体。如第二个问题中，指出了：“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是革命的“三结合”的基础……绝不许把他们当作陪衬，更不准把他们排斥在外”；在第四个问题中，明确宣布了“西南师范学院八三一战斗纵队、交通学院九一五战斗团等组织是革命群众组织”；在第五个问题中，提出了“在这次镇反工作中凡被错打成反革命的群众，一律平反”；第七个问题则再次重申不许保守组织“纠集原班人马打着‘造反’旗号，恢复原有组织，更不允许招降纳叛，改头换面重新组织，否则，立即取缔，对于首恶分子，必须……依法惩处。”

第九期二版刊登的会议消息中，报导了市革联会常委会的六条决定。“决定”则从措施上对以上原则进行了落实，如：“立即对重庆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和肃反问题进行周密的调查和处理，抽调一百名红卫兵，由两名常委同志亲自率领到八区三县检查，迅速纠偏”、“立即调查处理沙

市纱厂（即重纺六厂——笔者注。我之所以要特别注明这一点，因为紧接着，我将在这个事件中有一段九死一生的遭遇）等单位的问题，彻底打退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操纵保皇势力进行反夺权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凡是被保皇势力反夺了权的地方，革联会坚决支持并帮助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把权立即夺回来”。至于西师八三一，交院九一五等革命组织，革联会“现在公开认错，并听取他们的意见”。

会议能够取得这些结果，应该说还是不错的。《山城战报》第9期的消息是这样报导的：“各革命组织的同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充份发扬了大民主，发扬了敢想、敢说、敢造反的革命精神，用大量事实揭露了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在重庆的各种表现，同时对革联会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关于会场的气氛，只说了：“经过激烈的辩论”平平淡淡一语，而在我在日记中所记录的会场情况，却是非常激烈的：

“4月7日—4月8日。革联会召开炮轰大会。各革命造反派组织纷纷上台发言，申诉（或着说是控诉吧）本单位资本主义复辟的情况。解放军有很大的责任。当然，问题也是直接涉及到革联会的。／会上，展开了一场严重的斗争，血和泪的控诉激荡着人们的思想和感情。二轻兵团的一个代表跳上台去，大声说道：‘同志们，革联会是我们把它扶起来的，我们为它大喊大叫，为它鸣锣开道，可是现在它却成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工具，没有为我们干一件好事。我们不要它了！大家一道起来把他砸烂吧！’／一席话，把同志们激怒了，大家在下面乱嘘、起哄：‘滚下去！’‘滚下去！’。师专唐宗明走上去：‘同志们静一静，静一静，我说，革联会是我们自己的，有错误，有缺点，我们炮轰它，帮助它改进，砸不是办法……’外院余朝文冲上去：‘同志们，刚才这个人发言是个大阴谋，我代表川外八二六表态，坚决砸烂革联会！’全场大哗，一群人冲上去，把余推开，迅速在话筒前排成长队，要求发言。／‘我代表2307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发言，我们坚决支持革联会，革联会是我们自己的，革联会好得很！就是好得很！’／‘我代表八一兵团表态，我们坚决支持革联会，革联不能砸，只能炮轰，只能支持，革联会就是好……’／‘我说，我是二轻兵团的，刚才那个人不能代表二轻兵团，只能代表他自己，我们二轻兵团的广大战士坚决支持革联会，革联会就是好，好得很！……’／发言，一个比一个激昂。情绪，一个比一个冲动。会场上，掌声雷动，口号起伏，支持派和砸派，在这个会场上迅速地分化、集结……”

会议尽管吵得天翻地覆，但毕竟让多数代表对革联会达成了明确的共识，即消息所说：“大家一直认为，革联会是我们造反派长期浴血奋战的成果，革联会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决不能把革联会看得一团漆黑，一棍子打死。”会议的成功使得财贸系统815的头头王绍川，心满意足地代表革联会对大家的批评表示了“衷心感谢”。

（未完待续）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吕青（加拿大）	熊波（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